

骏马奖作家观察(十九)

# 将每一个字都书写在土地深处

——阅读马金莲

□苏涛

马金莲初登文坛的2000年左右,恰是“80后”在文坛引发诸多讨论之时。在彼时文坛一派众声喧哗的景象之下,马金莲展现出相当的独特性。她的文字中没有对传统的故意挣脱与叛逆,这和青春文学、网络写作截然不同;此外,其创作与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对欲望的过度呈现以及在小说技法上的过度炫技等,均保持相当的距离。读者在这位“80后”回族女作家身上看不到任何时髦的文坛标签,她不受消费主义写作的影响,扎扎实实地将双脚踩在厚重的西部大地上,自觉坚守在西海固的精神高地,安静地写作。某种程度上,马金莲辛勤的耕耘背后,是她生命内里的精神追求,是她心目中一直潜藏的对文学神圣性的守护。在各种新话语的流变之中,马金莲的写作使我们重新意识到,当下还有值得珍视的、恒定不变的东西。要理解马金莲及其文学,这一点尤为重要。

## 忠于经验又走出经验

马金莲的创作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与生命经验,并诚实地进行表达。她的文字守持于“诚”与“真”,通过乡土生活、女性立场、儿童视角完成自己的文学创作。其中,至为重要的便是她的女性书写。

马金莲笔下女性世界的隐秘心语及其成长故事,具有十分独特的辨识度。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女性书写并不是先有一种观念、理论,而是源自生命根部的渊源和经验。这在她早期的中短篇小说集《父亲的雪》《碎媳妇》中就已展现出来。如果将马金莲作品集的名称稍加罗列——《碎媳妇》《马兰花》《绣鸳鸯》《河南女人》《午后来访的女孩》《化骨绵掌》《我的母亲喜进花》《爱情蓬勃如春》等,便能从中勾勒、还原出马金莲笔下女性的形象谱系及其成长轨迹。读者从中所见到的每一个个体,并不是一种观念上的女性,“她”鲜活、具体,也困惑、悲伤,努力地成长与出走,即便在艰难的人生时刻也倔强而真实地生活。

以《碎媳妇》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其人生轨迹展现了马金莲的写作风格:生命如一条小溪流,没有大的曲折;生活似被一个固定机位呈现,从日出到日暮。她笔下女性的青春、爱情以及婚姻,都在一种朦胧的状态中被揭示。那是一种中国西部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生命状态。读懂这些女性,你才会了解马金莲为何如此言说,她的笔致缘何如此稳定与舒缓。这种看似“滞缓”于时代风潮之外的女性书写,成为马金莲思考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基点,也成为她所操持的语气调和话语方式。她于新世纪初期创作的这类善良的女性形象,为丰富当代文学的人物长廊作出了独特贡献。

可贵的是,马金莲没有囿于自身经验的舒适区,而是有意识地尝试突破自我,不断刻画出不一样的人物形象。在女性经验的突围上,马金莲至少从两个维度完成了自我超越。首先是在诗意的书写之外,正视乡村女性的生存夹缝和精神境遇,其中《掌灯猴》《舍舍》《鲜花与蛇》《项链》等小说颇为重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马金莲女性书写的厚度与力度。尤其是短篇小说《掌灯猴》,在层层推演下,将一位农村“丑女”的伤疤缓慢揭示,展现出马金莲非比寻常的叙事才华。在《午后来访的女孩》《化骨绵掌》等小说集中,马金莲笔下的女性由乡土世界进入城市空间,她走出自己经验写作的习惯场域,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深远的现实感与时代意识。

因此,通过对马金莲女性书写的考察,可以窥见一名优秀

在马金莲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双脚沾满泥土式的写作,作家始终将自己的文学之根扎在脚下这片厚重的大地上,以一种朴素而诚实的叙事方式进行创作。在如今这个快速变化的AI时代,马金莲的写作正在树立一个文学的标尺,即如何在变化中寻找不变,这种不变就是乡土中国生生不息的动人力量所在



《长河》,马金莲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11月

《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马金莲著,花城出版社,2016年5月

《亲爱的人们》,马金莲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

作家的成长史。在忠实于自我经验的同时,走出经验写作的惯性,从而让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普通女性,在真实而日常的生活中挺立,这正是马金莲写作的独特意义。

## 对生命运的深刻体恤

2013年首发于《民族文学》的中篇小说《长河》,为马金莲带来了不小的声誉。马金莲也凭借小说集《长河》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正如授奖辞所言,作品“从生老病死等基本生命活动中提炼深微的经验,在日常琐细的回忆乡村生活中照亮温润的人性,气象从容悠远,语言灵秀隽永”。2018年,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马金莲的创作由此进入一种井喷式的状态,短短数年内发表了大量小说作品。

小说《长河》共分为四章,分别描写四位主人公的人生无常。四个人物在春夏秋冬四季的四个案例,恰好涵盖了人生的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阶段。这部作品的重量,正是通过

对活着和死去的灵魂的深刻逼视来实现的。马金莲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淬掉了一种刻意与精致,她保留了生活原本的粗粝、不如意,包括随时可能降临的疾病和死亡。她的小说中没有人生中骇人的一面,没有戏剧与矛盾的撕裂;相反,她的写作注重诗意与抒情性,延续了“诗化小说”的传统,折射出的是作者的人生态度与审美观。她对平凡个体的观照和对人生无常的敏锐共情,充满了苦难下的深情感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维护着文学创作应具的人文底色。

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在马金莲这里,这种爱是贫瘠生活里的希望和良善。马金莲有一部短篇小说《难肠》,“难肠”这一方言土语精准浓缩了西北乡村社会的艰辛感。马金莲的叙述却伴随着苦难之外的暖意,这也是马金莲对生活最真实的态度。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是“一种清苦的幸福”。这种“清苦的幸福”体现在她以具体年份为题创作的“年代”系列小说中,如《1985年的干粮》《1986年的自行车》《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1990年的亲戚》《1992年的春乏》等。在这些作品中,她在追忆童年、怀念往昔中打捞光阴长河里的日常和温

情,进而呈现质朴美好的乡村伦理精神。与同时代其他短篇小说注重故事性的倾向不同,在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童年视角与回忆视角的相互交织,在一个自然而懵懂的世界中,她淡化苦难的一面,让人隐约感到一种打动人的美。她对那些逝去年代中的“干粮”“浆水”“酸菜”等物象的书写,是真正沉入生活细部的“微观诗学”,在传统与现代的缝隙间,展现出她对乡土中国的绵密心事。如在《1985年的干粮》中,母亲坚持将如奢侈品般的白面馒头给孤儿奴海子吃,从而维护了贫困中的那一抹温情与尊严。在马金莲不动声色的细腻叙事下,展现的是一种身体与灵魂相交织的写作,背后是对人的命运的深刻体恤。

## 对西海固的深情凝视

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持续发力的同时,马金莲的长篇小说《马兰花》《孤独树》和儿童题材长篇小说《小穆萨的飞翔》《数星星的孩子》等作品相继问世,展现了一名优秀作家在文体拓展和艺术探索上的不断精进。从初登文坛对扇子湾的细致描摹,到《长河》《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之后对故乡的深度开掘,马金莲立足西海固,对故土进行着持续的书写,进一步让西海固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地理空间。可以说,马金莲对西海固的历史与现实深谙于心。经过数年深耕细作,马金莲带来了8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对她而言,这是一部对西海固进行全景式呈现的集大成之作。作品在宏大时代主题与微观日常表达的张力间,在对干旱贫瘠的故乡和对坚忍厚实品格的书写下,史诗性地展示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80万字的体量不但对作家而言是个巨大挑战,亦是马金莲对当下碎片化时代所作出的诗意抵抗。更为重要的是,《亲爱的人们》让我们对现实题材创作依旧充满敬意,这依然是中国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学样态。小说从20世纪80年代末写到21世纪的当下,跨越改革开放40余年,囊括几代人的发展历程。马金莲在展现现实主义精神底色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观察中国社会的独特视角和真诚态度。

时至今日,在马金莲身上丝毫看不到任何的趾高气扬、矫揉造作,相反,你感受到的是一种谦虚而亲切的态度、真诚且美好的情感。尤为可贵的是,马金莲在成名后并未离开西海固,而是依然以在场的方式坚守在西海固的土地上。在马金莲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双脚沾满泥土式的写作,她将每一个字都书写在土地深处。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有底气写真正的农村、真正的乡土”。她的写作是有实感的,与那些在想象与幻想中进行乡土书写的作家相比,马金莲及其创作提供了一个真诚而踏实的存在。乡土生活是当下诸多作家共同的主题,但如何理解和进入乡土,则是作家之间重大的区别所在。今天的许多作家,可能和书写对象特别是乡土现场之间有相当的隔膜,马金莲这种书写乡土的态度,为其他创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纵观马金莲的文学创作,作家始终将自己的文学之根扎在脚下这片厚重的大地上,以一种朴素而诚实的叙事方式进行创作。在如今这个快速变化的AI时代,马金莲的写作正在树立一个文学的标尺,即如何在变化中寻找不变,这种不变就是乡土中国生生不息的动人力量所在。

(作者系宁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的版图上,彝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始终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底蕴占据着醒目位置。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苏越尔长篇小说《山候》,不仅代表着他个人从诗歌到小说领域的跨界突破,更是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人文温度与艺术纯度的彝族乡土题材作品。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初凉山彝区土地分包到户为时代切口,将一个名为鹿鹿觉巴的彝汉杂居村庄放置在社会转型的风口,用散点化叙事的徐徐铺展,勾勒出大凉山深处的生命图景与文明流变。阅读过程如同穿行在云雾缭绕的群山之间,既能听见历史的足音,又能触摸到一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坚守与蜕变的灵魂脉络。

阿苏越尔从1986年起发表诗歌作品,其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铸就了他沉稳、内敛、诗意盎然的文学品格,也为《山候》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鹿鹿觉巴村既是作者的故乡,也是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典型场域,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冲突,而是以生活流、民俗流、情感流的方式多点推进,将时代变革悄然融入日常烟火,将改革开放之初,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被改变,山区迎来外界文明涌入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变化既给家乡带来发展的契机,也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碰撞。毕摩微慕史布是故事的精神轴心,他熟知经文仪式,默默守护着民族文化根脉,成为传统文明的象征与载体。以阿苏木牛、格播阿夷、佩德支铁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在传统婚姻、外出谋生、求学求知的多重选择中苦苦挣扎、徘徊、出走与回归,作者通过对这一群人命运轨迹的刻画,折射出彝族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突围与心灵呐喊。他们与德古老人、基层干部、猎人、教师、普通乡民等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起,共同构成鲜活饱满的山区社会群体,绘制出一幅展现彝区山乡巨变的全景式画卷。

小说命名为《山候》,意蕴深远,耐人寻味。从表层看,“山候”指山地气候、自然节律、节气物候,大凉山的风霜雨雪、四季轮回,构成故事发生的天然背景;而从深层去解读,“山候”更是时代之候、人心之候、民族文化之候。群山在等候,乡民在等候,古老的传统文明在时代变

# 献给凉山大地的心灵之歌

——读阿苏越尔长篇小说《山候》

□周其伦

局中等候着它凤凰涅槃的归宿。作者这种苦心孤诣的双重寓意,让小说超越了一般乡土叙事的局限,具备了哲学层面的思考与人文层面的关怀。阿苏越尔以诗人的敏感与细腻,捕捉到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张力,客观呈现出二者在共存、拉扯、磨合与坚守中的博弈,书写出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复杂与真实,使作品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

作为从诗歌跨界到小说领域的作家,阿苏越尔在《山候》中展现出独特的语言艺术追求。小说微妙地承袭了他的诗意质感,克制、凝练、富有画面感,文字间流淌着山地的空灵与厚重,读来如沐山风,余味悠长。他将大量彝族民俗、毕摩仪式、山歌谚语自然嵌入娓娓道来的叙事中,充满鲜活灵动的质感,也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彝族文化的窗口。故事结构上,小说采用散点透视、群像叙事的方式,开阔而从容,与大凉山的地域气质高度契合,可称之为“大凉山田园牧歌与时代之歌的合唱”。

更为可贵的是,《山候》始终扎根于民族精神内核,张弛有度地描绘彝族人源远流长的精神原乡,以微慕史布的家族历史为情节经纬,让彝族的风情、伦理、记忆扑面而来,在现代社会潮流快速推进的今天,传统文化面临着流失风险,精神家园的守护已然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山候》以文学的方式对这一命题作出深情回应,它既回望传统,凝视文明的根脉,同时也直面现实,潜心思考民族的未来,小说由此具有了鲜明的时代价值与文化意义。

从艺术价值上考量,《山候》凭借鲜明的民族性、独特的艺术性与深刻的思想性,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文学新意。阿苏越尔以赤子之心书写故土,以敬畏之心传承文化,以悲悯之心观照人生,使作品兼具历史的纵深感、现实的针对性、丰富的审美意蕴。《山候》亦是作者创作道路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小说叙事沉静克制,用民族的滋养守望精神家园,是作者扎根大地、贴近心灵,书写时代变迁的生动实践。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

# 一部横切面式的民族精神史

——评侯波长篇小说《雪猎》

□李安伟

黑龙江鄂伦春族女作家侯波长篇小说《雪猎》,通过细腻的笔触、独特的女性视角,生动记述了鄂伦春族姐妹艾玛汗、艾戈艳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轨迹。艾氏姐妹代表的不是个体,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肖像,身上折射出鄂伦春族勤劳勇敢、崇尚自然的优秀品质。她们的一生跌宕起伏,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发展等多个时期,她们的故事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命题深邃而温情的文学应答。

《雪猎》中,艾玛汗、艾戈艳姐妹的每一次选择,都与民族命运的转折密切相关。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我心底一直藏着一个愿望,就是实现姥姥的心愿:写一部横切面式的描写鄂伦春族的小说,展现鄂伦春族古老、神秘的传统文化,抒写鄂伦春族勇敢勤劳、崇尚自然、豁达乐观、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把鄂伦春族的生活呈现给大家。”她做到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生动的、横切面式的故事。她以见证者的姿态、平凡人的视角,诠释宏大历史叙事中的微观镜像,塑造了艾戈艳、卡图尔、艾玛汗、苏赫欠、李天安、阿迈、阿震等人物,形象回答了鄂伦春族人在面对传统与现代、山林与平原、游牧与定居等多重选择的情况下,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问题。她没有单一地复述历史,而是将人物命运、生命体验、情感波动等自觉融入叙事中,并试图借助人物的眼睛,来见证被她们“创造”的历史。艾玛汗、艾戈艳所经历的“下山定居”,是在在场者第一视角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下山”对于两姐妹而言,不仅仅是一次迁移,也是一次精神蜕变,更是价值体系的重构。任何人在经历蜕变时,都会面临不

同程度的思想斗争与阵痛,最后完成涅槃重生。正是这样一种充满波折的心理变化,为小说故事奠定了感情的基调。

在侯波看来,“《雪猎》里有一个鲜活的人物,一则是真实的故事,还有鄂伦春人的民间故事、神话故事、谚语……从不同角度展示鄂伦春人的生活,展现鄂伦春族的历史变迁”。这些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故事,生动勾勒出鄂伦春族的精神图景。世代生活在小兴安岭的鄂伦春族,一直以来都坚守着崇尚自然的法则。小说中有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细节:苏赫欠和族人一起去打猎时,对受伤的动物悉心呵护,这印证了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整部小说中,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始终,无论是面对新生产方式的挑战还是新的文化冲击,鄂伦春族人始终展现出一种内在的不屈韧性。“不管赌输赌赢,你是铁了心要加入我们的队伍!”依尔欠憋得脸通红说:“是啊,一路走来我看明白了,也想明白了,我要像艾玛汗一样跟着你干!如果不同意就当我说。”对话中,依尔欠的决绝,印证了鄂伦春族人的不屈性格,侧面展现了他们主动融入时代变革浪潮的无畏气概。艾玛汗暗自发誓要为丈夫苏赫欠报仇,主动加入革命队伍,充分展现出鄂伦春族女性的坚韧与顽强。

一个有着独特气质的古老民族,面临着自然生态、民族文化和现代生活之间的多重选择,他们必须主动适应和调整自身发展路径,来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从艾玛汗、艾戈艳姐妹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关键节点的选择来看,作者意欲通过小说来探讨鄂伦春族的民族精神如何在新时代传承这一宏大命题,进而找到鄂伦春族融入现

代社会的合理化路径。

《雪猎》主动、自觉地将鄂伦春族的故事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发展的宏大叙事中。鄂伦春族下山定居与获得新生,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生动体现,更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例证。鄂伦春族走出深山,与周边各民族比邻而居,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在共建家园的同时实现了经济上的互助、生活上的融合、文化上的互鉴。这种日常化的、浸润于生活细节中的交融,有力诠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内涵。小说将两姐妹的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紧密相连,折射出国家这个“大家”的繁荣、富强、稳定。

在第八章中,小说这样写道:“新生!可以说是艾玛汗的新生,她从厄运中走出来;也可以说是艾戈艳的新生,她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还可以说是所有鄂伦春人的新生,大家告别了斜杠柱的历史,结束了饥一顿饱一顿……”还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利。”是的,“新生”,鄂伦春族人在时代的浪潮中激流勇进、奋发向上,选择了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侯波所说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雪猎》是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学实践。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写的那样,作为鄂伦春族第三代作家,她将继续用笔抒写民族精神,为讲好中国故事尽一份力量。

总而言之,侯波深深扎根鄂伦春族的生活现场,在真切感受民族团结、进步与交融的鲜活故事的同时,用自身的实际行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新鲜动力。

(作者系集宁师范学院创意写作中心负责人)